

历史文化书系

近代来粤传教士评传

JINDAI LAIYUE CHUANJIAOSHI PINGZHUAN

主 编 雷雨田
副主编 张 琳



百 家 出 版 社

历史文化书系

近代来粤传教士

主 编 雷雨田
副主编 张 琳

评 传



4P.6041
669

ADG26/10

百 家 出 版 社

6503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来粤传教士评传 / 雷雨田主编. — 上海: 百家出版社, 2004.5

ISBN 7-80703-019-4

I. 近... II. 雷... III. 传教士—评传—广东省—近代 IV. B97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3630 号

丛 书 名 历史文化书系
书 名 近代来粤传教士评传
主 编 雷雨田
副 主 编 张 琳
责任编辑 丁翔华
装帧设计 张 宙
出版发行 百家出版社 (上海天钥桥路 180 弄 2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常熟市兴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60×980 毫米 1/16
印 张 25.75
插 页 2
字 数 428 000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ISBN 7-80703-019-4/B·3
定 价 32.00 元

内容提要

(广州市教委九五规划项目)

从16世纪开始,世界历史已进入资本主义时期。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大批基督教传教士先后来到中国。他们伴随着列强的战舰大炮,主要以文化传教和慈善事业的方式,广泛深入到中国的都市乡村,激发和推动了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的高潮,并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同时扮演着积极与消极两重性的矛盾角色。岭南长期以来是中国开放的前哨阵地,近代欧风美雨也最先吹打了这块古老的土地,而在19世纪,其文化载体和媒介主要是体现西方近代文化的基督教传教士。他们在进入内地之前,一般都是先在广东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然后在这里开基,或逗留于此地,或向内地拓展。鸦片战争前后在中国发生的重大国际事件,几乎都有他们的参与。据不完全统计,长期在广东活动的传教士约在600位以上,他们的足迹几乎遍布岭南的穷乡僻壤,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活动于广东的这一特殊宗教群体的研究论文、专著极少,对他们在广东社会、经济、文化方面影响的探讨是学术上的一个缺环。本书对16位来粤著名传教士的生平与活动进行了详细评介,附录中又收集了百余位其他传教士的小传或散记,基本上提供了来粤传教士的总体概貌,弥补了学术界的空白,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课题打下了基础。

本书主要特点是选择了在广东活动的传教士中的代表人物加以详细评介,又罗列了其他部分传教士的简历,既吸取了近年来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又有作者的见解,资料翔实,语言活泛,适合各阶层的读者阅读。

本书主编雷雨田：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中国路德研究会主任，长期从事基督教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出版的专著（合著、译著）有《当代基督新教》（东方出版社，1993）、《上帝与美国人——基督教与美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基督教与近代岭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广东宗教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路德文集》（1～2卷，上海三联书店，2004）、《光明的世纪》（澳门新国际出版社，2003）等以及60余篇论文。

序

从16世纪开始，世界历史已进入资本主义时期。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大批基督教传教士先后来到中国。他们伴随着列强的战舰大炮，主要以文化传教和慈善事业的方式，广泛深入到中国的都市乡村，激发和推动了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的高潮，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同时扮演着积极与消极两重性的矛盾角色。岭南长期以来是中国开放的前哨阵地，近代欧风美雨也最先吹打了这块古老的土地，而在19世纪，其文化载体和媒介主要是体现西方近代文化的基督教传教士。他们在进入内地之前，一般都是先在广东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然后在这里开基，或逗留于此地，或向内地拓展。鸦片战争前后在中国发生的重大国际事件，几乎都有他们的参与。据不完全统计，长期在广东活动的传教士约在600位以上，他们的足迹几乎遍布岭南的穷乡僻壤，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这一特殊宗教群体的研究论文、专著很少。本书对近代16位来粤著名传教士的生平与活动进行了详细评介，附录中又收集了百余位其他传教士的小传或散记，基本上提供了来粤传教士的总体概貌。

天定命运——基督教的世界主义

传教事业，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传播和宗教扩张活动。基督教在这方面的热情，可谓诸教之冠。早在原始创教时期，其教主耶稣就告诫他的门徒到世界各地传教，广纳信众，宣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



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①福音书中也记载了耶稣身体力行，先离开自己的诞生地伯利恒，然后到加利利以及耶路撒冷等地，传扬上帝的“福音”即好消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带着自己的十二个得力门徒，四处巡游，显示神迹，治病传教。耶稣在十字架上殉难后，其十二门徒承继他的事业，建立教会，继续传扬上帝的福音，最终使基督教突破犹太人的种族局限，获得了地中海周边民族的皈依。显然，基督教能够成为一种世界宗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救世的世界主义观念和全球传教的不懈实践。这两大因素铸造了历代传教士的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与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

耶稣会



在近代殖民主义的浪潮中，西方种族主义理论家炮制了所谓的“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原则和“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论调，在美国则有“天定命运”的口号，把殖民主义扩张说成是上帝赋予白人的一项使命。美国宗教民族主义者的代表人物斯特朗曾经宣称，美国基督教及其民主机构和制度的扩展，将把世界带进上帝的“完美的千年王国”。因此，西方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乃至帝国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说是基督教世界主义的衍生物，成为近代西方大批教俗人士海外拓展的神圣动力之一。在宗教方面，从16世纪起，西方基督教会各大宗派几乎



都建立了不同规模的宣教组织,到20世纪初期,其海外传教士人数激增。据1973年的《传教手册》公布,在北美的海外差会中,仅基督新教方面就有485个,有37 000名传教士活动于世界百余国家。在中国,到20世纪20年代,大约有16 000名西方传教士活动于全国各地,甚至边远的蒙古、新疆及海南岛,都留下了传教士的足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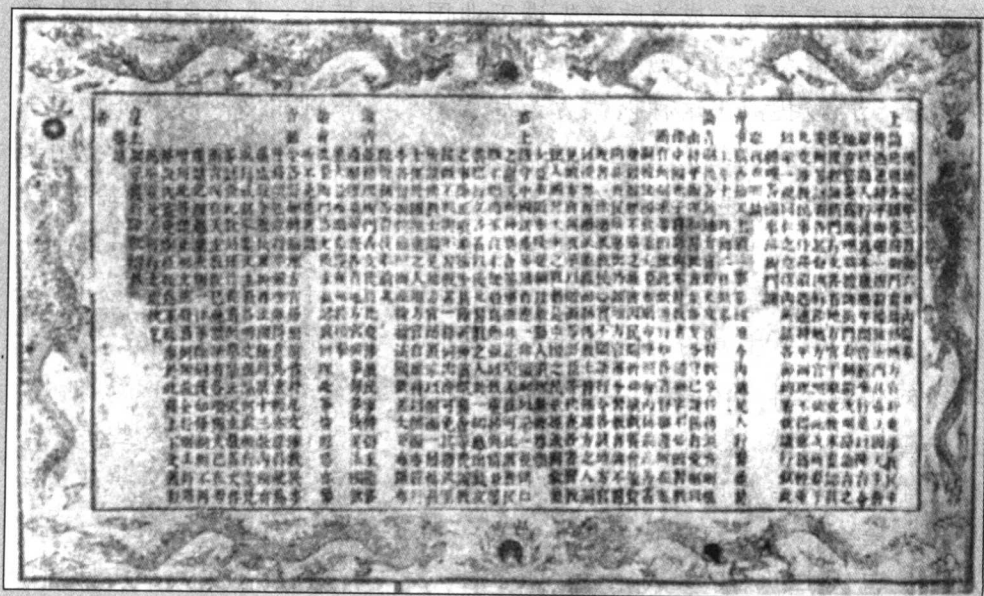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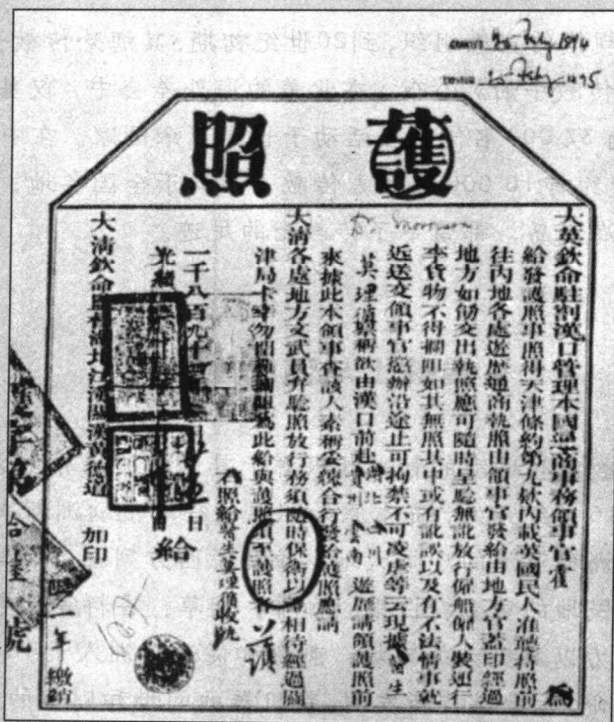
传教士与殖民主义

近代基督教传教运动的勃兴既根源于其固有的世界主义,又得益于殖民主义。从16世纪开始,资本原始积累的狂潮把欧洲新兴资产阶级推进到非洲、美洲和亚洲的广阔天地,拉开了西方列强“血与火”的殖民史的帷幕。殖民地的黄金、白银、咖啡、烟草、香料等无穷财富、亿万廉价黑奴劳动力以及庞大的市场,刺激和促进欧洲人于18世纪60年代开始了工业革命。无数科技新发明、新机器的问世和财富的急剧增长,使资产阶级如虎添翼,成为欧美先进工业国对外扩张、瓜分全球的强大动力。在战舰和大炮的轰鸣声中,近代西方基督教文明向古老的亚非拉文明提出了严峻挑战。这种以武力为后盾的文化帝国主义,同经济帝国主义和政治帝国主义结成三位一体的侵略扩张势力,使基督教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宗教,加速了人类各文明形态交碰冲撞、融合同化的痛苦历程。

在传教士的思想观念中,常常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杂糅一起。所以,他们虽以传播福音为主旨,但在实际活动中,许多人具有传教士、探险家、殖民者多重身份,成为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先驱和工具。传教士组织的相当一部分差会是本国殖民活动的产物,受政府派遣或资助。它们探查殖民路线,搜集情报,充当了征服军的马前卒。所以这些传教士颇得本国殖民当局的青睐,被雇用为译员、文书、参赞、领事等职。某些传教差会不仅是殖民侵略的先遣队,而且往往本身就是殖民者。它们广占良田沃土,从事经商活动,甚至参与奴隶与鸦片贸易。在中国,19

(上图) 外国侵略者以游历、考察、传教为名进入我国内地。图为1894年汉口英领事填发的护照。

(下图)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屈从列强意志，颁布袒护外国教会的谕旨。



世纪中叶以后，个别传教士曾利用强买恶索、盗买盗卖等手段强占房地产，有的人同当地官府恶霸相互勾结，包揽词讼，引起许多教案的发生。事实证明，这些传教士的贪婪比其他殖民者毫不逊色。

西方差会还是近代国际政治的重要因素之一。西方诸列强侵入亚、非、拉地区，其国旗后面跟着的常常是大兵、商人和传教士，后者是一支特别兵种。连西方学者也承认，传教站既是西方文明的输出前哨，也可以被称为“西方文明和政治侵略的工具”。在鸦片战争爆发前，美国基督新教传教士裨治文所创办的《中国丛报》，向西方人介绍了大量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情况，是当时中西交流方面最重要的刊物。但其某些作者，又同时积极为殖民者出谋划策，甚至撺掇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美国新教牧师伯驾在此最早提出了“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的口号。^② 迫使中国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天津条约》、《黄埔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都有传教士的直接策划或参与。

由于许多西方传教士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列强征服世界的活动，从而为本国资本家、商人和政治家垂青。美国总统塔夫脱曾盛赞传教士的活动“比一切条约和国际法庭都更有效”。难怪欧美列强为保护传教士的渗透活动，不惜使用外交压力和治外法权，甚至诉诸武力。1856年在中国发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就直接与不法传教士有关。

传教士与全球一体化进程

基督教是世界上两种古老的希伯来文明和希腊罗马文明交织融会的产儿，它的世界主义，以及后来衍生的霸权主义，使它几乎与世界上所有文明都有过接触、碰击和交融的悲欢离合过程。文化，始终是基督教在精神与心灵之战中赢得诸归化民族的最重要的法宝。如果说，鸦片战争之后基督教在中国的大规模推进与扩张，曾伴有武力强逼这种外在因





素的契机，那么，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就主要得益于富有文化教养的耶稣会士及其他派别的传教士和中国知识阶层的信徒，有效地进行了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的文化交流活动。但另一方面，鸦片战争后也因此而使西方传教士和中外其他人士发起和推动的中西文化交流事业，在规模、范围、深度和强度方面，更为宏大，超过前代。原因如下：首先是时代的变化。中国国门洞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西方人士进入中国提供了合法依据，传教活动也由秘密转为公开，由非法变成合法，有些还得到西方政府政治上、物质上的支持和中国官方的保护，教士推行的文化事业有了更广阔的天地和内容。其二，基督教新、旧教社会伦理的时代差异。旧时代的天主教，社会观和宗教观均趋保守。明末清初耶稣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天主教差会的东来，与西欧天主教宗教主宰权的丧失、信徒人数的减少和影响衰落过程中兴起的“反宗教改革运动”有关。西失东补，故其传教活动，以争取信徒皈依为宗旨，以传经布道为主要内容，其对科技文化典籍的译介，不是自觉的行为，而是作为传教手段而被动为之。因此，当时担当中西文化传播角色的天主教士，具有较多的宗教气息，其文化活动范围亦较狭隘。鸦片战争后，除天主教以外，又有大批基督新教差会涌入中国。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所创立的基督新教各派，适应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文化需要，而当时的资本主义潮流又进一步推动了新教的近代化、世俗化和社会化进程。此外，新教派别林立，异议纷呈，既增添了宗教文化的宽容性，又带来了更多的竞争性。所以，它们在中国虽然仍以传教为宗旨，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内容，却更为多样化和世俗化。19世纪以来，西方工业革命已经完成，在科技、经济、文化等方面，已经遥遥领先于东方，加之中国人向西方探觅真理、变法图强的迫切心态，使传教士能够借此强劲的欧风美雨浇灌东方干涸之地，从而又有了更大、更多的活动机遇。其三，传教士的特殊结构。在中西交往的过程中，西方商人、外交家、大兵和传教士都不同程度地扮演了一定角色。但后者的结构与旨趣同前者有较大差异：商人惟利是图，外交家争权掠地，军人为主子效命。至于



传教人员，作为知识阶层，他们以上帝为至尊，就整体而言，不惟任何世俗权威之命是从，如君主、政府或商团等。他们带着较多的文化和人道主义色彩，特别是近代的传教士，更具有较多的世界主义目光和情怀。他们的确同西方殖民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本身多数并不是殖民者，其旨趣也与此相异。相反，作为西方文化的传播媒介，他们比其他任何社会阶层都更有兴趣，也更有资格扮演近代早期中西文明交流的主要角色。1807年第一位来华的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就公开宣告，“科学与启示之光必将逐渐和平地照耀到东亚与日出之岛上”。美国传教士伯驾来港入粤，亦受到“把科学与基督教传向全球”这种精神的推动。其四，参与者队伍的扩大。文化传教方针，是明末清初及近代来华传教士的一贯策略。但在天主教时期，文化活动往往是个人行为，有组织的活动或未出现，或规模较小。至基督新教人士来华后，文化传教意识更为浓烈，在宣教过程中辅之以西方科学和人文思想的传授，其文化活动，扩大到有组织的行为，有些还得到中外政府和有关团体的襄助和支持。

以基督教为主体的西方文明，亦被人们习惯地称为基督教文明。它自身的文化要素及其在传播过程所运用的文化手段，构成了西方文明最重要的播扬方式之一。虽然近代的传教运动，与殖民主义政治和经济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但它在本质上，却是历史上一场最波澜壮阔的文化交流活动。

西方传教活动加速了第三世界殖民化的进程，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看到，近代基督教大扩张中掀起的东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与交融，加速了世界的近代化与一体化进程，这是基督教世界主义对人类社会的最深刻的影响。传教士是西方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他们主要从事的是宗教和文化活动。另外，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已逐渐“资本主义化”，成为西方近代文明的要素。因而，近代基督教广泛传播到第三世界，是西方文明扩张、文化挑战的重要形式，且有殖民主义的大炮、兵舰之助，带来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程度更深的多种文明的交碰冲激、融合同化的痛苦历程。在东方，基督教同地方宗

教和文化结合，给古老的东方文明注入了新的血液，为后进民族提供了文化选择、文化竞争之机。例如，在印度某些地区，印度教、基督教的成分相互交融，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因子。在印度尼西亚，基督教激励了穆斯林的改革，使伊斯兰教同现代社会和理性思潮较为协调。传教士在日本一定程度上改造了日本佛教，使其从西方借来了教育青年和宣传信仰的多种方式：格言、小册子、古代信条的现代翻译、街头服务、主日学校、慈善机构、改写了的基督教赞美诗等。甚至基督教的某些节日也为佛教袭用。二战后日本出现的126种宗教，几乎都受到基督教的影响。^③ 东方社会和文化中的若干陋俗，如偶像崇拜仪式、猎取人头、寡妇殉葬、种姓制度、裹脚、纳妾等，都受到传教士的抨击。在基督教流行之地，传统文化结构及社会风尚，如夫妻关系、性准则、经济伦理、血缘关系甚或姓名组成等，都受到激烈的冲击。在美洲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中，基督教和地方宗教的成分杂糅，创造了一种新宗教，用新的神学启示来解释部落风习，加速了原始部落的文明进程。基督教的大规模渗透与扩张，有效地促使处于静止或衰落状态的亚、非、拉文明进入重组或解体期。

基督教传教运动的兴盛期是19-20世纪，时当工业化完成，西方文明已先进于东方。因此，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知识阶层的传教士，把许多西方近代文明成果介绍或再现于东方社会，推进了落后地区近代化的进程。谁经受了这种挑战，临危思变，谁便能跟上时代进步的潮流，摆脱落后挨打的厄运，立于先进民族之林。日本便是一例。在圣经等宗教文献之外，传教士还翻译了大量人文学科及自然科学方面的非宗教著作，开启了亚、非、拉人民的知识，同时也将科学和民主观念传播开来，促进了这些地区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当然，这并非传教士的自觉行为）。例如，朝鲜独立运动的许多领导人都是基督徒。印度一些地方和国家领导人在教会学校中学到了西方的领导、管理方式。有人认为，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源于《圣经·新约》中耶稣的“登山宝训”，下层阶级及山区部落维护和扩大合法权益的要求受到传教团的推动。在中国，太平天



国领袖们从基督教中悟化出革命的理想，康有为自认受过传教士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影响，孙中山、蒋介石都是基督徒。20世纪30年代中国《名人传》中所列的人，35%是教会培养的。当时中国90%的医护人员都是基督徒。另一方面，西方真正了解东方，也首先依赖于传教士的介绍，儒家典籍且对欧洲启蒙运动和近代文明的形成提供了镜鉴。此外，西方差会因为本国殖民活动培养买办，扩大影响，或出于人道主义目的，在

亚、非、美洲创办了近代学校、医院、诊疗所、孤儿院等，特别是教会学校，传播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培养了一批现代科技人才和具有民主思想的新式知识分子与买办。许多虔诚的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西方传教士和基督徒，对当地人民怀有深切的同情，几十年如一日地献身于出版、教育、医疗等福利慈善业，受到世界人民的尊重，在人类文明交流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页。在传教士中，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分子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都是怀有世界主义目光的人道主义者。

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先进的运输和通讯工具以及西方工业革命后的经济腾飞，促使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体化成为需要也成为可能。任何文明(包括基督教文明本身在内)，都无法在现代社会洁身自好、闭关自守。经过观念更新之后的基督教，沐浴着近代文明的曙光，通过炮舰、传教士为媒介，打开了东方古国的大门，迫使“异教文明”或吐故纳新，锐意改革；或抱残守缺，落后挨打。所以，西方传教运动既造

1 宋毓林	香港	Removed
2 孫日新	香山翠亨鄉	
3 人媽	省城	Removed
4 蔣中桂	香山翠亨鄉	Deceased
5 唐旗	" " 唐家 "	
6 任顯德	香港	
7 宋連好 小	" "	Removal
8 宋江燭 小	" "	Deceased
9 周慈愛 小	" "	"
10 任顯日 小	" "	"
11 陳神重	恩平長灣村	

孙中山受浸名单

成了民族隔阂、对抗，另一方面又构筑了世界文明相互挑战、相互容纳的桥梁，其社会作用十分复杂，难以片语概之。

传教士与岭南社会和文化

15、16世纪以后，是人类对赖以生存的地球以及人类自身重新发现、重新认识、重新建构的时代。在这个充满着“血与火”的岁月，西方传教活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精神和文化领域，传教士在非西方世界成为移风易俗、文化交融的“播火人”。近代的广东，得风气之先，在迎接欧风美雨的挑战中，走在了内地的前面。利玛窦、罗明坚等传教士在澳门、肇庆、韶州和广州的一系列活动，使部分广东人对当时的世界有了一个认识。当时的中国统治者，仍以天朝大国自居，夜郎自大，根本不了解外部世界的巨大变化。利玛窦来华以前，传教士的在华活动，仅局限于没有文化的下层群众之中。利玛窦来到广东后，进入士绅、官僚的活动圈。他凭藉这些特殊阶层，在广东开辟了新的传教路线。他开始以知识传教，在宣传各种知识的同时，夹带教义。利玛窦在肇庆时公开展出的各种西洋奇器，如西洋镜、自鸣钟、世界地图，威尼斯出产的三棱镜，意大利的花边织物，精美的油画圣母像等，对广东官员、乡绅、民众非常具有吸引力。这种活动，一方面为其接近和结交华人，获得他们的好感，进而引导他们入教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开辟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河，广东则承风气之先，使外来文化在这里创造了许多个第一。例如，上述西洋器物，是在肇庆第一次展出的，肇庆也是西方军事、医学、建筑、乐器、绘画、制造品的最早展现之地。1521年，广东官员仿制了西方火铳，驱逐在粤葡萄牙人出境。三年后，南京铸造西洋兵器时，曾从广东借调工匠和学习方法。16世纪，西医院在澳门首先建立，如1569年后陆续建立的圣加札医院、拉匝禄医院和圣拉费尔医院等。澳门的教堂和西式民居都是在中国最早出现的西式建筑。1582年罗明坚送给广东



制台陈文峰的一台大自鸣钟，经广东人仿制，造出了享誉全国的“广钟”。中国文化的西传，也肇端于来粤传教士。沙勿略、利玛窦等人的大量信件，最早向欧洲人传达了中国文化的信息，促使汉学的兴起。1698年来华的法国汉学家的先驱马若瑟，对中国文物、经籍有过深入研究。他于1728年在广东写成的《中国语札记》一书，是西方人探研中国语文特点和结构的第一部专著。他还把元代杂剧《赵氏孤儿》译成法语，后来伏尔泰对其加以改编，取名为《中国孤儿》，多次在英、法上演。马若瑟的上述两书，在欧洲颇有影响。来粤传教士所编字典及语法书，以及在广东翻译出版的各种圣经小册子、宗教书籍和其他文献，从其术语的参同与融通以及文字的表述等方面，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广东语音和特点。他们所介绍的岭南风情方物、文化习俗等，在西方人眼中，就是中国的典型。所以，明末清初的广东，在世界近代化的大潮中，以较为开放的姿态迎接当时欧风美雨中这一最重要的代表和传媒——天主教传教士们的依附趋同和熏染同化。在这里，形形色色的中外人士，有意或无意地建构了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津梁、枢纽和中国各种变革的发源地，通过澳门、广州、肇庆、韶州各个焦点，向全国辐射，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扮演了先进和模范角色。

基督教自明末传入岭南以来，历经四百年，已经在这里打下一定根基，特别是在澳门、香港和广州等地，形成了基督教发展和传播的重要中心。早在1565年，澳门的天主教徒就已经达到5 000人，占居民人数的80%以上。1782年，广州的男女天主教徒12 000人。1914年，基督新教在广东有教堂924所，教徒48 347人，占全国基督新教教徒人数的1/6以上；天主教有教堂464所，教徒约100 000人，占全国天主教徒的6.3%。从总体上看，基督徒在岭南人口中的比例并不高，但基督教的影响却不能以教徒数字而论。因为在世界三大宗教中，基督教最富有扩张性，惟有它设有专职传教士，大力鼓吹向世界各地播扬基督教的福音。此外，传教士与教会的活动，其形式的多样，内容的驳杂，于文化的至密关联，都是佛教和伊斯兰教所望尘莫及的。而在中国，“看破红尘”的佛

教僧侣和炼丹修仙的道士，常隐匿于深山老林，与世隔绝，到近代几同民间迷信合流，呈现衰落的趋势。基督教传教士和基督徒在中国社会上却显示出极大的活力与能量，第二次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层出不穷的教案、非基运动和“三自”自立运动，都与它有关。可以说，在岭南历史上，任何宗教都没有像基督教这样充当了如此重要的文化传播和促进者的角色，引起这样众多和如此规模的社会运动。

基督教徒既是普通民众，又是宗教与社会群体，他们在岭南社会与文化生活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产生着超过其他任何宗教社团的特殊影响。20世纪20年代，传教士的足迹遍及岭南的穷乡僻壤，而在广州三角洲地带和村落稠密的地区，传教事业极为兴旺，几乎每镇都有教堂，不少地区基督教的势力及思想影响几乎达到无处不在的地步。差会及基督徒团体在本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特别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政界信奉基督教的人数很多，1912年，广东省政府官员中的基督徒高达65%。广州的“中华归主”运动以全城为范围曾震动于一时，广州基督徒发起的禁赌运动更是改良社会的壮举。广东在近代化进程中于政治、商务、教育、新闻、出版、医药等方面的先进地位，与基督教会的教办事业及其影响是分不开的。

在医药事业方面，早在1834年美国派遣的第一个传教医生伯驾来粤之前，基督教差会就决定要把医疗事业“作为福音的婢女”，利用医药扩大教会在中国的影响。传教士医生曾经把西医西药的科学技术知识首先引进到岭南，在此训练出一大批西医和护士。1920年广东省有教会医院39所，如博济医院、柔济医院等。在中国，解放前大多数医护人员都来自于教会医校或医院。教会在广东不仅最早引进了西医西药，而且较早地将西方的医学教育制度介绍到广东，著名的南华医学院、夏葛医学院和特纳护士学校，在国内享有盛名。此外，在职业教育方面还有广州的端拿高护职校、博济高护职校、佛山的循道高护职校、曲江的循道高护职校、番禺的普惠高护职校等。

在文化教育事业方面，自1807年马礼逊将基督新教传入广东以后，

